

思政第一课

新时代中国青年应有的样子

□ 张传慧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

我们常说,时代的性格就是青年的性格,时代的精神就是青年的精神。什么是新时代中国青年应有的样子?

首先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100多年前。有这样一位大学教师,每月拿到几百块大洋的薪水,在当时足以养活四五十人,几个月的工资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不错的四合院。但他在北京生活了10年,一处房产也没有;他将大部分工资都用到了革命事业,放弃了舒适安逸的生活,选择了“为庶民求解放”的道路,并为这牺牲生命。他,就是革命先驱李大钊。

当年像李大钊一样,工资优厚,不缺吃喝,但坚定投身革命的先进青年还有很多,比如青年时期的朱德,他在滇军任职期间,月饷有1000块大洋,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抛弃高官厚禄投身革命,这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崇高的信仰。目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他们立志要改变这种现状。个人的安逸富足不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情怀与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他们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用生

命始终践行崇高的理想。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希望大学生们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成长为胸怀远大理想的有志青年。

接着让我们把目光定格在1935年。在校学习本应是学生的天职,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策动了“华北五省自治”,整个华北地区形同沦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深深刺痛了青年学生的心灵,他们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呐喊。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平学联的组织动员下,1万余名大学生主动担负起抗日救亡的时代责任,举行了大规模的请愿示威游行。

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有30多名学生被捕,100多名学生受伤,但他们并未退缩、就此停止。在强烈的历史责任与担当的驱使下,北平学生和市民一共两万多人,在一周之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样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热烈响应。可以说,

“一二·九”运动是青年学生被压抑的爱国热情的一次集中释放,是主动担当时代责任与使命的生动写照,不仅点燃了民众胸中的爱国激情,更有力促进了全国抗战高潮的到来。

时代呼唤担当,“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拼搏奉献,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尤其需要大学生们发扬担当精神、增强担当意识,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冲得出来、顶得上去,勇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20世纪60年代。说到“木兰围场”,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水草丰沛、鸟兽繁多的景象。但是在清朝晚期,山林植被遭受大规模砍伐破坏,作为“木兰围场”一部分的塞罕坝,逐渐退化为不毛之地。为了阻挡沙源、涵养水源,1962年,3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青年集结到了塞罕坝,拉开了艰苦卓绝的高寒沙地造林工程的大幕。当时塞罕坝极端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摄氏度,“一年一场风,年始到年终”。大家缺屋少粮,住的是窝棚和草坯房,风雪一刮就像冰窖一般。由于缺乏经验,两年里种下的几千亩幼苗,最终成活率还

不足8%。

但这批年轻人痛定思痛,研究缘由,决定从头再来。最终,他们带着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挺进“马蹄坑”,使幼苗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尽管之后又遭遇过自然灾害,损失惨重,但他们不畏艰苦,一代又一代接力守护,创造了百万亩流沙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书写了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青春篇章。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当今大学生是沐浴着新时代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一代,但肯吃苦、能吃苦的优良传统不能丢。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可能在敲锣打鼓、轻轻松松中实现,新征程上必须继续艰苦奋斗,以刚健有为的精神风貌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当前。今天,当我们享受着北斗导航为我们手机打车、点外卖提供的便利以及为国防事业带来的安全时,我们应当感谢的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30岁出头、持续奋斗26年的航天科技北斗团队。

面对西方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与打压,3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不顾任务艰巨、条件艰苦、经费有限,在10平方米的仓库里率先进行北斗核心难题的科研攻关;为了测试恶劣天气对卫星的影响,瘦弱的女研

究员长期背着十几斤重的设备,在零下40多度的东北野外工作。正是因为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北斗人有着不服输的骨气、拼命干的勇气,始终在科技创新道路上奋勇攀登,才实现了自主导航、卫星链路等一批核心技术的突破,以及关键器部件的100%国产化。从1994年北斗立项,到2000年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再到2020年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完成,北斗团队,一路筚路蓝缕、筑梦逐星,他们用艰辛探索、接续奋斗实现了对国内导航应用定位的全面主导,打破了美国GPS的垄断,撑起了国人的脊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实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路虽远,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大学生要把持续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强化精神素养、练就过硬本领,努力锻造成为堪当大用的栋梁之材,把奋斗的足迹印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殷切寄语广大青年“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这既是党对青年一代发出的伟大号召,更是新时代中国青年应有的样子。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鋒力量。希望大学生自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茁壮成长,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重任、发扬吃苦耐劳精神、保持奋斗激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挺膺担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书写壮丽青春篇章!

鲁商文化底蕴助推思政育人工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婷 通讯员 张艳

在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鲁商文化博物馆里,有一份特殊的藏品,包括古钱币42枚、民国纸币10张、汉代青铜箭头1枚、毛主席写给延安印刷厂的信(20世纪50年代印刷本)1件、清代秀才手抄本1本。这份藏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全部由该校艺术学院建工专业学生冯贺向学校无偿捐赠,所赠藏品均系其业余爱好收藏。

“学校浓厚的鲁商文化底蕴为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浸润和滋养,我也很高兴能为学校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冯贺说。

近年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借助鲁商文化推动思政育人效果彰显,冯贺无偿捐赠个人藏品的行为,正是其生动缩影。

建成于2016年的该校鲁商文化博物馆,目前馆藏展品种类500余种(套),重在介绍鲁商经道义、营生息、顾国谋利的精神底色。“依托鲁商文化博物馆,我们专门打造了‘专委会·博物馆·研究所’贯通融合的鲁商文化研究系统。”鲁商文化博物馆负责人冯成伟介绍。

为了使思政育人系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与精髓,提升学生商业素养,该校构建起“线下、线上、现场教学”三课堂贯通融合的课程教学体系。不仅先后开设了商科专业系列课程《商务素质养成》《中国商业史》等线下课程,还主持建设了山东省《中华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教学资源库》,主持建设中国大学MOOC(慕课)《中华商业文化》,实施线上教学;利用鲁商文化博物馆、商超广场、文化广场实施现场教学。

目前,“博物馆、老字号、学生社团”贯通融合的鲁商文化实践体系,构成该校在思政育人方面的显著特色。

一方面,将鲁商文化博物馆打造成“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基地”,建设3D虚拟博物馆,对全校师生和社会开放,同时将其作为新生入校教育的必修课,使学生在参观学习中了解鲁商和中国商业史,体悟传统商业文明与精神。

同时,学校定期举办老字号掌门人讲座、学术研讨会、“探秘老字号”研学之旅系列老字号进校园活动,组织学生实地参观老字号、参加老字号博览会,了解老字号历史、文化、经营,从而触动、入心。

鲁商文化化学社就是颇具代表性的学生社团,由一群热爱鲁商文化的学生组成。在此基础上,该校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社科普及志愿服务队”,参与鲁商文化研究,担任鲁商文化博物馆和校园鲁商文化景观的讲解员,将课堂所学知识和调研所得的成果融入教育实践过程中,架起精英学术研究与全体学生培育之间的桥梁。

从2016年成立至今,已培养近百名学生讲解员,接待参观学习3万余人次,用自己的精彩讲解向参观者展示了学校良好的育人成效,广受好评。

正在现场讲解的徐世榕说:“进入鲁商文化化学社,学习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份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做一名合格的讲解员,自身要对鲁商文化感兴趣,努力将每一件藏品背后的故事以最生动直观的语言呈现给大家。”

在校园里,一群穿汉服的同学活力四射,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原来他们在开展剧本杀活动。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开展校园剧本杀项目研究,打造了沉浸式剧本和寻宝解谜特色品牌活动。

“我们针对鲁商文化定制的沉浸式剧本,把各个角色的生平背景、人生经历,以一系列故事作为串联,将鲁商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形式、特点,不同鲁商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融合进行演绎,通过模拟的事件看真实世界的商战沉浮,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瞬间变得鲜活了起来。”林朝安介绍说。

在该校学生工作处处长李江看来,“剧本杀活动利用博物馆内已有的景点设施设置多重谜题,让学生们在解谜的过程中充分游览博物馆,同时更深入地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是我们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推广文化故事的尝试,同时有助于借此引领学生正确价值导向”。

近年来,该校不断创新文化育人模式,系统的文化教育使得学生的文化素养得到明显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文化艺术素养和创新创业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走到工作岗位后,这种优势得到更明显的体现,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文化素养、思想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意识、职业精神、创新能力等评价较高,满意度超过98%。

“文化自信、文化育人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精神源泉,是高职院校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源动力,更是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我们在商科人才培养过程中,积极践行‘立德树人 兴商润民’的使命,构建‘教学-研究-实践’贯通融合的育人体系,搭建了‘校园景观群-博物馆’相互依托的育人平台,由此实现文化育人与技术技能培养有机结合,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文化支撑。”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朱超说。

杨士莪院士:真正尖端的东西只能自己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递向向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教育基金捐赠100万元的支票,9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杨士莪希望年轻人接过接力棒,“为服务国家战略和推动水声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这一天是9月1日,哈尔滨工程大学建校70周年。在远离大海的黑龙江哈尔滨,杨士莪带着一届届学生,与大海打了一辈子交道。

作为我国水声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水声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的名字或许很多人没有听过,他研究的领域相当冷门却是国防命脉。“真正尖端的东西,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骨气。”

近日,杨士莪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寄语大学生,要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要爱祖国、爱土地、爱人民,永远跟着时代前进,只要是国家需要人民需要的,都是值得做的”。

“不是转专业,而是发展”

杨士莪与大海、与水声学相遇,颇费了一番周折。

他的父亲杨廷宝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即便经历了战火纷飞学的动乱年代,小时候的杨士莪也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随着知识的增长,面对千疮百孔的国家,他也逐渐认识到,“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

16岁那年,高中毕业的杨士莪选择了离家很远的清华大学。在重庆南开中学一同读书的班同学周光召的影响和建议下,他们一起进入物理系学习。在他看来,物理介于工程和纯学术之间,更有实用性,未来发展前景更广阔。

杨士莪所在的四人宿舍是妥妥的“学霸宿舍”。“像我这种爱玩的,也经常在图书馆看书,一个礼拜大概学习60小时。周光召这种刻苦的,一个礼拜的学习时间都是75小时以上”。

后来,从这个“学霸宿舍”走出了三位院士:周光召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高伯龙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杨士莪在水声学领域有了自己的一番成就。

1950年11月,新中国第一所正规海军高等专科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到清华大学招人,上大四的杨士莪已提前完成了学业,他便果断报名参了军。

两年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前身)在哈尔滨筹建成立,杨士莪奉调哈军工,担任海道测量专业教员,讲授测量天文学、球面天文学等课程。经过几年间的发展,哈军工已初具规模,可作为重要战略科技的水声科技在我国却是一片空白。杨士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1957年开始实施“尖端专业集中、常规专业分散”的方针,他所在的海道测量专业就在调整之中。

与此同时,面对我国长期有海无防的困境,国家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其中包括派遣少量科技人员到苏联科学院声学所学习。教学优秀的杨士莪,便在选派进修之列。

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水声学。从学习物理学到教授天文学、海道测量专业再到水声学,用时下流行的词

语来讲是“转专业”。

可杨士莪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叫发展,叫做面向国家需要去拓展工作领域。“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原先学的东西,在新专业里也会有用武之地。”

不过,他还是发现,即便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再好,也有研究室的大门对留学生紧紧关闭。“一个是声响研究室,一个是船舶噪声研究室,都和国防建设紧密相关。”他意识到,“想要从别人那里学到尖端技术是不可能的,最终还得靠自己”。

了解了国外水声技术的发展情况,学成归来的杨士莪认为,哈军工原有的声响专业涉及面很窄,“实际上,水声学是一个涉及领域很宽的学科,没有一定的知识,想要发展水声科技是达不到更高水平的”。尽管当时只是一名年轻教员,他还是向学校提出建议,让声响专业扩展至水声工程专业。

在学校多方努力下,中国首个理工结合、覆盖全面的水声专业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这里走出来的人才占据了水声科技研究的大半壁江山,这里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水声工程事业的摇篮”。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军工纪念馆里,还保存着杨士莪用日、德、英、俄4种文字记录的笔记,那是杨士莪满腔热血投身水声科学学习的见证。“年轻嘛,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干劲儿十足”。

9月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第一站就来到了哈军工纪念馆。习近平强调,哈尔滨工程大学要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为建设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再立新功。

何惧大海深和远

要想搞懂大海的“脾气”,免不了要出海做海试,这也是水声工程专业的必修课。

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百废待兴。“往返一次深海,至少要半个月的时间,还要有一定吨位的大船。”杨士莪说,那时候国家没有钱,多少年来,都是在近海做水声研究。“深海到底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直到1994年4月,悬挂着五星红旗、承载近百名科研人员的“勘测三号”和“实验三号”水声科学考察船驶入我国南海,这也是我国首次自主探索这片海洋。

这一年,杨士莪63岁,作为考察队队长和首席科学家的他十分激动。这是中国首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声科学综合考察,堪称“中国水声界从浅海迈向深海的第一步”。

为了这一次远航,中国水声科研人员筹划了整整10年。

杨士莪对于南海并不陌生。早在1959年,他作为中方副队长就参加了“中苏联合南海水声考察”。那一次,中方人员大多对水声并不熟悉,靠的也是苏联的设备。“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属于启蒙,就是让当时我国水声科研人员知道了水声考察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干。”

“海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茫茫深海,再大的科考船都犹如一叶扁舟,杨士莪说,海上天气阴晴不定,刮风下雨时无法作业,晴天时就要连轴转,大家昼夜不停,8个小时换一次班,“我就没办法了,要从头盯到尾,不过不要紧,每两个钟头我就会出

去转一圈,然后回来休息一两个钟头,再继续”。

除了天气因素,出海的第一大考验是晕船。他笑称,团队里曾有一位同事被他戏称为当之无愧的“晕委会主任”,每一次出海,都要带一边放着暖壶和水杯,一边看着试验仪表,另一边则要放着一个桶。“喝口水,记两个数字,就是吐一口。大约70%-80%的人,出海都会晕船。”

一次海试进行到后期,食品和饮用水近乎用尽,“只剩一点宝贵的米和一桶盐,怎么办?那就白天做试验,晚上捕鱼,以盐水煮鱼为食,一直坚持到了试验结束”。

“大海变幻莫测,坐在家搞研究肯定是不行的。”杨士莪觉得,每一次海试都像打仗一般,“咬咬牙就得咬牙,如果怕苦怕累就不要搞科研了,做科研最需要坚持不懈的精神”。

在他看来,现如今出海做试验,又有了新的挑战与考验。“试验船租金贵了,要在有限的科研经费下完成任务,有时候只能租一艘民用小船,所以不是条件更好了,而是有了新的艰苦的一面,这都需要现在的年轻人去克服。”

“创新是科研人员的基本功”

20世纪60年代,我国举全国之力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研制工作,大批科技工作者投身其中。

作为中国水声定位方法最早的提出者和技术决策者,杨士莪带领团队开展水声定位系统研制,完成“东风五号”洲际导弹落点水声测量系统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的水声定位系统研制工作,也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定位系统研制等重大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还主持设计了中国首个“重力式

低噪声水洞”,在国际上提出水洞噪声实验测量方法。

在杨士莪看来,创新是科研人员的基本功。他经常教导学生,“科技创新不要死读书,要学习的是研究方法、创新思路,哪怕到了工作岗位,也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才能掌握新的技术,占领新的高地”。

1997年,俄罗斯水声专家弗拉基米尔·休罗夫到访交流,杨士莪了解了他们正在进行的矢量传感器相关研究。在此之前,他也已关注到一些国际上对矢量传感器的研究动态。

但在我国水声界,该方向的研究一片空白。这激发了杨士莪的科研斗志,但没想到的,是之后一塌糊涂。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我国水声界对他和团队在这一新领域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后来,杨士莪应邀到中国科学院声学所进行了一场专门针对矢量传感器的报告,以回应国内水声界的质疑声。那一次,中国现代声学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马大猷也来到了现场,他对杨士莪说:“你们学校的这个研究好,非常有前景。”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这次报告减少了水声界的一些质疑,但新事物的研究,仍然道阻且长。面对外部的质疑和非议,杨士莪带着团队一直坚定地加紧研究步伐。

在他看来,科研期间遇到困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要说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是不存在的。遇到问题,不要解决问题绝不是要靠一个人,而是要靠一个团队的协作,可能别人的一句话,就成为激发大家思维的火花。”

“一站到底”

这些年来,杨士莪荣获了诸多荣誉:2022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优



9月24日,安徽阜南阜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活动中心指导学生们做月饼。中秋节将至,该中心举办“我们的节日·精神家园”迎中秋活动,让学生们在实践活动中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享节日的快乐。视觉中国供图